



世界野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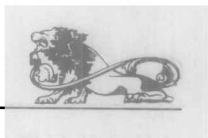


世界野史

主编 博 轩

第四卷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U-2 的命运

多了一只眼睛

这是 1960 年 5 月的第一天，巴基斯坦白沙瓦空军基地一派沉寂，四周戒备森严。突然，一阵轰鸣声打破清晨的宁静，跑道上一架枕戈待发的飞机箭一般地射向了蓝天。此时正是当地时间 6 点 26 分，华盛顿时间晚上 20 时 26 分，莫斯科时间凌晨 3 点 26 分。

这架没有国籍标志的黑色飞机就是当时名噪一时的美国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U-2。U-2 是专门为从事高空摄影侦察而设计的，由蜚声世界的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公司制造。用“U”作为飞机名字的前缀，表示是“实用飞机”，以免引起外界非议。这种飞机的机身修长、尾巴高、翅膀宽，从瘦长的侧影看，它更像一架滑翔机。为了提高飞机升限，笨重的起落装置由细小的轮子所取代，起飞后即被抛弃。这样着陆时，飞机不得不以腹部降落，这也同滑翔机一样。飞机上没有武器装置，只装有拍照用的巨型照相机。这种特制的照相机在 25000 米的高空，拍摄面积可达 12000 平方公里，在 250 平方公里范围内以实体镜头拍摄的照片完全具有立体效果，影像十分清晰。此外，为了隐蔽地运往世界各地起飞，整个飞机还可以肢解，装在运输机或货车内，运到飞机场。

当然 U-2 飞机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升限高，它可以在 25000 米以上的超高空飞行，在这样的高度上，一般的截击机和地空导弹都够不着它，更不要说防空高炮了。故而，它被认为是不可击落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自从 1956 年正式装备以来，它从挪威、联邦德国、土耳其、巴基斯坦、日本、阿拉斯加等地不断起飞，飞越苏联领空，侦察苏联的空军基地、导弹发射场、潜艇船坞、工厂、核试验场等，取得了大量的情报，至今还未被击落过一次。为此，苏联政府曾提出过多次抗议，但由于鞭短莫及，又抓不住什么真凭实据，美国政府根本不予理睬。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艾伦·杜勒斯曾经在私下说过：“U-2 飞机就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只眼睛，通过它可以掌握苏联境内的一切重要目标，甚至地面上一棵小草也逃不过它的监视。”

正是由于 U-2 飞机的特殊性，所以它的一切行动都由中央情报局提出计划，总统最后批准。当然这次飞行也不例外。此行的目标是苏联，具体航线是从巴基斯坦飞越阿富汗，进入苏联境内，沿着咸海、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基洛夫、阿尔汗格尔斯克、摩尔曼斯克飞行，最后在挪威的布德机场着陆。中央情报局之所以选择今天派遣 U-2 飞行也是有所考虑的：第一，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估计苏联会放松警惕；第二，据了解，苏联制造了一种比美国最大的火箭还大一倍的火箭，今天要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火箭基地上进行试验；第三，根据天气预报，“五·一”天气好，可以拍下清晰的照片。

坐在驾驶舱里的飞行员是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中尉。本周三，他还在土耳其阿达纳的美军基地。那天，他和妻子一起吃了一顿“像样的午饭”，然后就吻别了她，与其他二十几个飞行员、军官和技术人员一起，乘一架运输机飞到了白沙瓦，来准备这次飞行。此刻坐在这狭小的座舱里，他又想起了那顿妻子亲自做的午饭，牛排、火腿……基地每餐配



给的食物尽管很有营养，但总不是那么可口。好啦，7个小时之后，又能和妻子相聚了。她已经提前从土耳其飞到了挪威。

苏联境内横行无阻

60分钟后，飞机开始进入苏联领空。此时，夜幕中的莫斯科红场上，工人们正在为“五·一”庆祝活动作最后的预演。鲍尔斯与基地指挥塔通过最后一次话后关掉了电台发射机，除了飞机发动机的呼啸声外，周围一片沉寂。不知怎的，此时一种恐惧感在鲍尔斯的心头隐隐升起。作为受雇中央情报局的U-2飞行员，他已数次驾机飞越苏联领空了，以前还从未有过这种感觉。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同伴们一直在议论说，俄国人生产了一种新的防空导弹，射高可达30000米，然而上司否定了这种说法。但愿这一切不是真的。

想到这里，鲍尔斯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座椅旁边固定的一个小包。这是救生包，留作飞机遇难时飞行员跳伞后救生时使用的。里面包括可折叠的救生筏、衣物、水、食品、指北针、信号灯、火柴、点燃湿木头的化学药物、急救包、常用的打猎工具以及一面丝绸旗子，上面用14国文字写着这样的话：“我是美国人，不懂你们的语言。我需要食品、住处和帮助。我不会伤害你们，对你们的人民亦无恶意。如果你们帮助我，将得到报酬。”看起来上司为飞行员想得已十分周到了。当然，他的飞行服上衣兜内还装有一枚“硬币”，这是中央情报局专门为间谍们在突发情况下自杀而特制的一种装置。看起来很像一块普通的硬币，上面有一个能系在钥匙链上的圆环。在两面银币中有一根很小的针，针上带一种甲壳类动物的毒素。只要用这种针在身上刺一下，便立即死亡。

飞机继续在25000米的超高空航行。下面的气象条件比预计的要糟糕，一块由于寒冷凝聚而成的绒毛般的云层遮住了苏联大地。往前便是鲍尔斯的第一个目标——丘拉坦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发射场，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和其他卫星就是从这里被送入太空的。发射台被云层盖住了，但周围地区还是晴朗的。鲍尔斯不停地使用着各种侦察相机。

一会儿飞机穿越咸海，沿着通往车里雅宾斯克的铁路线向北继续飞行。左而是象牙似的乌拉尔山脉，这是古代欧亚两洲的分界线。山脉两侧的丘陵地是碧绿的。天空开始清晰明朗，鲍尔斯觉得轻松了些，不时扫视着春光明媚的苏联大地。

导弹追击

这时，突然自动驾驶仪出了故障。飞机开始倾斜，机头朝上。他立即关上仪器，用手操纵了几分钟，然后又打开了自动仪，但很快又出了毛病。接着他又试了一次，故障依然没有排除。于是他索性关掉它，完全用手操纵飞机。他知道手控是危险的：必须保持住机身的平稳和控制飞行高度，要全神贯注地盯着各种仪表，计算时间，控制方位和各种仪器。如果机头过高，航速势必降低，从而导致发动机熄火。重新启动发动机必须降到10000米以下，而在这种高度，飞机容易被地面防空武器攻击。

是否应该返航？如果一小时前发生故障，那么返航是很自然的，但是现在已经深入目标境内1300英里。于是，他决心继续前进，完成计划使命。

下一个目标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18年，尼古拉·沙皇二世和他的全家就是在这里



被布尔什维克杀掉的。“这个倒霉的城市!”鲍尔斯心里突然想到。

接近目标了,鲍尔斯把手放在了照相机开关的按钮上。突然,他听到了一声沉闷的撞击声,接着飞机开始剧烈震动,橙黄色的闪光照亮了机舱和周围的天空。“天哪,我被击中了!”他大声惨叫。

鲍尔斯左手紧紧握着油门杆,右手抓住操纵杆不放,竭力想恢复飞机的平衡。但是机头还是向下栽去,此时飞机已完全无法控制。

又是一阵剧烈的颠簸,鲍尔斯在驾驶舱里被摔来摔去。接着机翼断裂了,机头朝下,遍体鳞伤的机身旋转着向地面坠去。

鲍尔斯伸手去摸座椅旁边的弹射开关,然而刚伸手他又缩了回来。他突然想到,按下弹射开关后,也许随着一声爆炸,他和飞机就会同时化为碎片,这是他的一个同伴曾经这样告诉他的。中央情报局为了在飞机遇难后,不给对方留下任何证据,偷偷地改装了弹射装置,只要飞行员按下弹射按钮,飞机马上就会被炸成碎片。也许这是真的,中央情报局这帮家伙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看来想活命,只有爬出驾驶舱了。他伸手向上用力推开舱盖,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他的身体被甩出了舱外。但是,氧气管仍然固定在飞机上,使他未能脱离飞机。该死!怎么忘记拔掉氧气管了。他拼命挣扎着身体,终于脱离了飞机,想必是氧气管被挣断了。

橙白两色相间的降落伞在鲍尔斯头上张开了。他掀开面罩,一股寒气直冲肺腑。飞机的碎片纷纷从四周坠向地面,冷飕飕的空中一片寂静。他俯视大地,看见绿油油的山岗、一洼湖水,还有道路和楼房。突然他心中产生一种回归故里的感觉。这片土地看起来几乎与老家弗吉尼亚州一样,已经很多年没有回老家了!

然而,他马上清醒过来了,这毕竟是苏联的国土。他把手伸进飞行服的兜里,拿出了那枚硬币,解开小环,摔掉两半银元,用指指和食指捏住那根毒针。两年前,一架美国飞机不幸坠落在亚美尼亚,当地的俄国人几乎把机组中的一个人吊死在电线杆上。他把毒针放进口袋,以备不测。

鲍尔斯想控制降落伞飘进小树林,但风却把他吹向湖上。如果落入湖中,也许沉重的装备就会把他坠入湖底而送命。但幸运的是,风继续把他向前刮了一段。下面出现了一片新翻的土地。那里有一个农民正驾驶着拖拉机在耕地,另一个在堆积木柴。突然,又出现了新的险情——高压电线!他急速下落,离电线越来越近,地球向他迎面而来。他使劲抖动着降落伞绳,双脚终于落在了苏联的土地上。

被活捉的飞行员

莫斯科红场上,一年一度的五一阅兵正在有序地进行着,一排排士兵、学生、农民、运动员方队在军乐队的伴奏下,从检阅台前缓缓通过广场。纸板作的和平鸽在队伍中晃动着,几百只真的和平鸽则从人们头顶上掠过。像当年斯大林一样,站在列宁墓上的赫鲁晓夫一面欢呼,一面用手抚摸着应邀和领袖们站在一起检阅游行队伍的少年儿童们的头发。

突然,国土防空军总司令比留佐夫元帅匆匆掠过陵墓上的人群,走到赫鲁晓夫身后,在他的耳旁悄悄地报告说:U-2飞机已被击落,飞行员被活捉。比留佐夫离开后,赫鲁晓夫不动声色地继续检阅游行队伍。但敏感的记者和外交官们已经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



重大事件，因为这位元帅忘了穿礼服就上了检阅台。

赫鲁晓夫是在莫斯科时间凌晨五点钟得知 U-2 飞机入境的。当时，他还在床上躺着，想象着当天上竿的检阅场面。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电话中报告说，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越过阿富汗边境，已进入苏联领空。不用说，这又是 U-2！他果断就向国防部长下达了命令：“无论如何要把它打下来！”

放下电话，赫鲁晓夫再也躺不住了。美国佬欺人太甚了！想当年，赫鲁晓夫亲自率领政府代表团正式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马里兰州的戴维营举行了两次私下会谈。会谈虽然没有就主要议题——裁军问题达成什么协议。但是作为妥协，艾森豪威尔表示，他已不再反对赫鲁晓夫几个月来一直在谋求的进行东西方首脑正式会谈；赫鲁晓夫则放弃了拒绝西方希望尽快签署对德和约和撤出柏林的要求。他们还商定再在巴黎举行会晤。届时，英法领导人也将参加。赫鲁晓夫满心以为这次会谈将成为冷战以来的第一个转折点，因而在国内的报刊上大肆宣扬，说这种“戴维营精神”标志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然而，刚刚才过去 7 个月的时间，美国人就恢复了 U-2 飞机的人侵活动，尤其是在今天——苏联人民最隆重的节日里，而且距巴黎首脑会谈也只有两个礼拜了，这怎能不让赫鲁晓夫沮丧呢？

恼怒归恼怒，冷静地想一想，赫鲁晓夫对能否打下 U-2 来心里还是没底。尽管他知道国土防空军已经装备了最新式的“萨姆-2”防空导弹，该型导弹有效射高可达 25000 米，但毕竟以前还没有打下过一架入侵的 U-2 来。

带着这种心情走上检阅台的赫鲁晓夫尽管表面上装出一副节日的笑脸，内心一直还在想着可恶的 U-2。听完比留佐夫元帅的报告，他终于可以轻松一下。但是，他知道好戏还要等着瞧。

弥天谎言

苏联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从早开到晚，U-2 飞机成了会议的主题。会议结束时，意向已经明确：向全世界公布 U-2 飞机入侵事件，但不提飞行员已被活捉一事。

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们的计划是迷惑美国政府官员，只要美国认为飞行员已经死了，他们就会不停地编造荒言，说飞机因偶然原因偏离了航线，在边境山区上空被击落，坠入苏联境内，等等。”

该让艾森豪威尔丢脸了。“美国佬已经不知羞耻地把屁股撅了过来，那么就狠狠地踢他一脚吧！”他在回忆录中如是说。

果然不出赫鲁晓夫所料，美国人走进了圈套。艾森豪威尔在得到中央情报局关于 U-2 飞机可能在苏联境内被击毁并保证飞行员绝不可能生还的报告后，5 月 3 日批准由国家航空与航天局发表以下声明：

“国家航空与航天局的一架气象飞机，于 5 月 1 日上午 9 时左右（东部时间上午 3 时左右），在土耳其执行航空与航天局和美国空军的联合气象侦察任务时，坠落在土耳其凡湖地区。在土耳其东部空域飞行时，飞行员曾用应急频率报告，机上氧气设备出现故障……”

5 月 4 日，苏联政府正式宣布击落 U-2 飞机后，美国务院发言人林肯·怀特面对记者



的一再追问道：“完全有可能由于氧气设备故障，飞行员因缺氧失去知觉，飞机自动控制继续飞行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后，无意中侵犯了苏联领空。”

5月5日，美国各大报纸大量刊登国内“人民”的声音，要求政府谴责苏联击落民用飞机事件。

5月6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宣布失踪的“非武装气象侦察机”上的飞行员叫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并请求苏联外交部就飞机和飞行员的下落提供“全部事实”。

正当美国人在挖空心思不断编造“真相”时，5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即将结束，按计划赫鲁晓夫在下午致闭幕词。读完闭幕词后，他取下眼镜，扫视了一下台下数千名苏维埃代表和特邀的数百名国内外记者以及驻莫斯科的各国使节，接着扔出了杀手锏：

“同志们，我必须让你们知道一个秘密。我们不仅击落了美国入侵的U-2间谍飞机，而且还活捉了飞行员。他已被送到莫斯科，他的名字叫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今年30岁。他说他是美国空军的一个中尉，在空军服役到1965年——也就是说他去情报局之前。”

台下一阵混乱。接着赫鲁晓夫拿出大张大张的航空照片向美国外交官和记者座席的方向挥舞着说：“这是军用机场的一些照片。这些是机场，地面上的战斗机，排成两行。你们看！你们看！”下面是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为了消除人们对飞行员还活着的怀疑，赫鲁晓夫披露了鲍尔斯的跳伞方式：因为座位有炸药，飞行员在弹出的那一刻飞机便会爆炸，他害怕在爆炸中送命，所以自己爬出了座舱。

赫鲁晓夫接着说：“他真够聪明的！但是，爆炸装置并不是他们采取的惟一防范措施。为了掩饰罪行，中央情报局要求飞行员绝对不要被我们活捉……他们必须用这种立即致命的毒针刺自己。多么毒辣！”赫鲁晓夫举起了毒针的照片，“这就是美国杀害自己人民的最新科技成果！……”

在事实面前美国政府终于停止了说荒，但是立即又换了一副新的面孔。

5月7日华盛顿时间下午3时55分，林肯·怀特走进了白宫新闻发布厅，面对频频闪亮的镁光灯大声朗读着国务院的公告：

“国务院收到了赫鲁晓夫先生关于在苏联境内打下一架没有武装的飞机的进一步讲话全文。正如以前所宣布的，我们知道一架U-2飞机失踪了。……无可讳言，在当今世界里，所有国家都在进行情报搜集活动，战后历史表明，苏联在这方面并不落后。由于苏联和自由世界相比过分地采取保密措施，因而作为合法的国家防务措施，增强这些活动是必要的。当今世界造成紧张局势的因素之一是担心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突然袭击。为了减少相互间的猜疑和做好防止突然袭击的保护措施，美国在1955年提出了‘开放天空’的建议，但这个建议遭到了苏联的反对。由于存在着遭到突然袭击的危险，因此，在过去四年中，没有武装的民用U-2飞机一直沿着自由世界的边境飞行……”

在这份声明中，美国政府不仅承认了U-2飞机的间谍活动，而且公开声称在过去四年中一直进行着这种活动。并且还暗示将来也不会停止这种活动。

美国政府的强硬声明无疑使得赫鲁晓夫处在一种难堪的地步。5月10日，苏联对美国政府的这种入侵行为正式提出抗议，指出，美国政府最近采取的行动目的“显然是要把美苏关系拖回到‘冷战’最坏时期的状态，并且恶化最高级会议前夕的国际局势”。



就在苏美政府就 U-2 飞机事件你来我往,互相指责的时候,5月14日,巴黎会谈开始了。美苏英法四国的首脑都出席了会谈。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就猛烈抨击美国侵犯苏联领空的行为,并要求美国宣布停止一切 U-2 飞机的飞行活动,对过去的侵略行动表示道歉。面对赫鲁晓夫的指责,艾森豪威尔,这位二战时的盟军最高司令不甘示弱,坚决拒绝向苏联赔礼。

巴黎会谈最终在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不欢而散。被苏联报刊大肆宣扬的“戴维营精神”就这样随着 U-2 飞机的坠落而粉碎了。

人质交易

1962年2月10日,星期六,座落在东西柏林交界处的格利尼克铁桥刚从寒冷的冬夜中醒来,桥上一个行人也没有,桥下的哈佛河无声地流淌着,四周一片寂静。8时20分刚过,桥西侧传来一阵隐隐的马达声,接着一辆乳白色的奔驰牌轿车无声地停在了桥头。几乎与此同时,桥东侧也开过来一辆黑色小轿车。两边小轿车的门同时打开后,分别下来3个人,缓缓地向桥中央走去。

谁也不会想到,这座为纪念1945年苏军与盟军在此胜利会师而易名为“团结桥”的大铁桥上此时正在进行着一个重要仪式——美苏间谍交换仪式。

从桥东侧走来的3人,中间的那人戴着一顶皮帽,穿着一件厚重的外衣,翻开的衣领里裹着一副冷漠的脸。此人正是 U-2 飞机驾驶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

1960年7月初,对鲍尔斯进行的长达61天的审讯结束了。鲍尔斯在静静地听着苏联法官的最终判决:

“为了金钱,他自愿出卖荣誉、良心和他所有的一切,他从事了犯罪活动,采用了给亿万人民带来极大危险的手段……他的主子企图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就是这些在所谓的自由世界中生长起来的鲍尔斯们,随时准备第一个向和平的土地投放原子弹和氢弹……但是,由于被告鲍尔斯真心实意地忏悔,法庭决定不判处死型,判处鲍尔斯有期徒刑15年。”

接着,面对挤得水泄不通的旁听席,鲍尔斯作了如下陈述:“我认识到我犯下严重的罪行,罪有应得。我知道,俄国人民把我当成一个敌人……但是,我希望今后无论我走到哪里,人们不要再把我当作敌人看待,而作为一个人,一个不愿与俄国人民为敌的人,一个对他所做的事情表示忏悔和深感遗憾的人。”

在莫斯科的鲁比安卡监狱里呆了1年零9个月的鲍尔斯自然想不到他的“自由”来得这么快。使鲍尔斯更想不到的是他是作为赫鲁晓夫抛向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又一束橄榄枝而释放的。

1961年1月20日,约翰·肯尼迪当选为美国新总统,这时在国内事务中被搞得焦头烂额的赫鲁晓夫一心想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打破由于 U-2 飞机事件而使苏美关系陷于僵局,以改善自己在国内外的政治形象。

就在肯尼迪宣誓就职的第二天,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召见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汤普森,通知他说,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第一招棋,他决定释放以前俘虏的两名 RB-47 间谍飞机的飞行员。



新总统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了这两名飞行员，并再次宣布他在大选时所保证的：从现在起不再派飞机进入苏联领空侦察。

1961年6月，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见了约翰·肯尼迪。在共进晚餐时，赫鲁晓夫首先告诉肯尼迪，前不久释放的2名RB-47飞行员是对他当选总统的祝贺。接着他暗示，他愿意以适当的条件作为交换释放鲍尔斯。

肯尼迪当然明白，鲍尔斯与他的RB-47同伴的身价已不一样，他已成为这一年多来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

于是，经过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斡旋，达成协议。用于交换鲍尔斯的苏联人叫鲁道夫·伊万诺维奇·艾贝尔，他是克格勃的前上校。1950年潜入美国以来，一直担任克格勃北美情报站的负责人。他于1957年被捕后被判处30年徒刑。交换地点定在连接东西柏林的这座“团结桥”上。

上午8时26分，交换仪式正式开始。在阴冷的晨雾中，艾贝尔在一名美国外交官和一位名叫约瑟芬·墨菲的U-2飞机飞行员的伴随下，走到这座墨绿色桥梁的中央；鲍尔斯也在两名克格勃的押解下，从桥的另一头走了过来。双方官员一言不发，艾贝尔由一名克格勃官员认领；鲍尔斯则由他的老朋友墨菲确认。双方验明正身后互相点了一下头，然后两个间谍缓缓地擦肩走过，钻进各自的汽车。就这样，整个交换仪式在无声中完成了。

第二天，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抢先报导了这样一则消息：

“昨天当地时间8时30分，在通往东柏林的格利尼克铁桥上，U-2飞行员鲍尔斯跨过了东西方分界线，终于回到了自由世界的怀抱。这标志着一场历时1年零9个月的U-2飞机事件的结束……”

然而，U-2飞机事件的终结，并不等于美苏间情报战的终结。相反，它却预示着一场新的情报战的开始。时隔不到8个月，一场更大的风波——“古巴导弹危机”又爆发了。

历史证明：只要有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就会有间谍活动，有情报活动就会有间谍、侦察飞机、卫星……

摩萨德的928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前夜的1967年6月9日，以色列部队从约旦河谷向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发动了猛烈进攻。在出动大批飞机进行全面轰炸之后，以色列的坦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破了叙利亚号称坚不可摧的戈兰防线。叙利亚煞费苦心建筑于戈兰高地的全部防御体系，在残酷的鏖战中顷刻崩溃了。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这次战斗以色列轻而易举、迅速取胜主要应归功于摩萨德特工人员伊力·勒恩从大马士革报回的大量情报，这可以说也是一场情报战的胜利。

周旋在阿根廷

1961年1月的一天，烈日当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一位风度潇洒的商人



迈着稳重而轻松的步子走下飞机。

没有人在机场迎接他。他叫了辆出租汽车，跟司机攀谈起来，听从司机的建议，他住进首都市中心的友谊旅馆。这位商人向旅馆接待处出示的护照上的名字叫迦迈勒·卡明·达贝兹。安置了自己的行李，迦迈勒便到繁华的大街上逛去了。

迦迈勒·卡明·达贝兹很快就搞清了在阿根廷定居的50万阿拉伯人经常光顾的全部饭馆。阿拉伯人有殷勤好客的传统，因此迦迈勒一有机会便对周围的人讲述自己的身世和经历。拿出全家照，他激动地谈起他的亲人们：父母多年以前离开了家乡叙利亚，到黎巴嫩贝鲁特去寻找财富，迦迈勒出生在贝鲁特，曾有过一个姐姐，但她在小姑娘时就离开了人世。由于在贝鲁特生活艰难，他们全家又迁居亚历山大城。这样，迦迈勒就在埃及度过了他的青春。父亲是位忠贞的爱国主义者，坚决要求全家人保留叙利亚国籍，并从小反复向儿子灌输热爱祖国的思想。迦迈勒还讲到他们怎样在一位远房亲戚的帮助下，于1947年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全家人开了一家纺织公司。后来，不幸破产，短时期内父母又相继去世。父亲在去世前，还要儿子发誓，终有一天要回到祖国叙利亚。

现在，迦迈勒成为实力雄厚的“卡贝斯进出口公司”总裁，他的寓所布置得十分豪华和雅致，毫不掩饰地夸张着他在事业上的成功。

这位叙利亚人总是兴致勃勃地谈论他的祖国，热烈地表示他有一天能返回祖国的宿愿。

一天，迦迈勒正在“伊斯兰俱乐部”阅读报纸和杂志，一位胖胖的中年男人跟他交谈起来。该人自称叫法罗拉德·萨巴赫·哈利利，是阿根廷首都最主要的阿拉伯文报纸主编。年轻的叙利亚人不失时机地向这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倾吐了衷肠。主编非赏高兴能碰到这样一位爱国的教友，因而便把他介绍给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的几位主要的阿拉伯著名人士，同时还把他引入了该市上流资产阶级外交界。

由于迦迈勒精通阿拉伯事务，在叙利亚大使馆的历次招待会上，都成了深受欢迎的座上客。一次晚会上，他又结识了使馆武官阿明·哈菲兹。迦迈勒一片炽热的民族主义感情深深吸引了哈菲兹，他真挚地建议迦迈勒加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并说：“今年年底我打算回国，为祖国作出我的贡献，如果你乐意，我们何不一起回去呢？”迦迈勒谨慎地回答：“将军阁下，我无比钦佩您的爱国热忱，如果我处在您的地位的话，我也会这样做的。我能否有勇气效法您呢？天晓得！”

此时，他们二人谁也不知道，有朝一日哈菲兹武官会成为叙利亚的总统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领导人。这以后他们多次见面，每次见面迦迈勒总是称哈菲兹为“将军阁下”，他们推心置腹，被捧得飘飘欲仙的武官在回答迦迈勒那充满敬意的问候时总是说：“你好，我的朋友。什么时候你才会说，你将回到大马士革帮助我们呢？”

阿拉伯特工部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个非常精明有效的机构，这个机构决不放过任何一个经常和他们的外交官及侨民接触的人，调查他们是否可信。无疑，迦迈勒·卡明·达贝兹成了秘密调查的对象。

调查的结果表明，一切都符合事实：在黎巴嫩确实曾有过一个叫这人名字的穆斯林，他移居了亚历山大城，后又到了阿根廷。

从此以后，迦迈勒得到了真正的阿拉伯爱国者的名声，他甚至得到了一张当地政府签发的护照。



迦迈勒仍然常常谈起他对故土的思念之情。因而4月初，他兴高采烈地告诉大家：他准备回大马士革了。没人对此感到意外。

所有阿根廷的朋友都把他们在大马士革私人朋友的姓名、地址告诉他，并给他写了向大马士革的企业家、政界人士的推荐信。他们说：“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以保证您这位刚刚返回祖国的人在安家的时候得到一切可能的帮助。”

大使馆很快就把一切必要的证件给他办理好。7月间，迦迈勒离开阿根廷，经伦敦和苏黎世，飞到了慕尼黑。

机场上只有一个叫哈密德的人在等他。在慕尼黑市中心的一家旅店里，迦迈勒·卡明·达贝兹交出了他的护照、官方证件和将为他在大马士革打开方便之门的推荐信。然后他脱去衣服，扔下全部瑞士和阿根廷的服装，换上一套较为朴素的穿戴。原来的衣服都放入哈密德带来的一只箱子里。接着二人握手告别。他抓紧时间给妻子、孩子买了些礼物，然后匆匆赶至慕尼黑机场，登上飞往特拉维夫的飞机。

这个迦迈勒·卡明·达贝兹实际上是以色列摩萨德的硬牌特工人员伊力·革恩，机场迎接他的哈密德也是一名以色列特工。伊力·革恩在阿根廷度过了6个月，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行动任务：研究并熟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理、政治、风土人情；学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出色地打进在阿根廷的叙利亚侨民阶层，建立起一个爱国者的形象。

“9.28”计划开始

伊力·勒恩回到以色列后，又接受了一个时间的新的专门训练，他要学会掌握新的密码技术和熟练使用在叙利亚使用广泛的防身武器手枪和施迈塞尔式冲锋枪，学会微型照相的新技术及使用方法。他还要经常与那些接受他电报的人保持接触。对于摩萨德总部的报务员来说，十分重要的是熟练地辨别出革恩发报的特殊指法，以便能在刹那间判断出收到的电讯是否是他们的特工人员发来的、是否是在被逼迫情况下工作的。总之，在整个训练过程中革恩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敏捷、勇敢和令人震惊的自信心。摩萨德的领导人暗自夸赞他是天才的谍报人员。

正在这时，1961年9月28日出现了一件令革恩和摩萨德头目无比振奋的事件：叙利亚发生了一次新的政变，哈菲兹得到全国的支持，把所有埃及专家赶出叙利亚，出任总统。

这时，以色列摩萨德正式决定，起用伊力·革恩派往大马士革，并命名为“代号928计划”。11月底，伊力·革恩又飞到欧洲，在慕尼黑重新跟哈密德接上头，摇身一变又成了叙利亚人迦迈勒·卡明·达贝兹。他身着一身笔挺时髦的瑞士灰色服装，手提黑色高档皮箱，皮箱里端放着一个电动食品搅拌器，搅拌器的支架里暗藏着一台大功率的发报机；而电动剃须刀的电线即是发报机的远距离发射天线；阿司匹林药片里藏着氰化物胶囊，用于杀死敌人或必要的时候自杀。

1961年12月20日，这位生意兴隆的叙利亚籍商人走进了开往大马士革的“亚贝特拉里号”客轮的头等舱。轮船上，他偶然同一名蓄着长长的大胡子、穿戴高贵、戴着金丝边眼镜的老头攀谈起来，原来这位老人叫马哈茂德·阿里，是叙利亚企业家联合会会长，大马士革的知名人士。他们一见如故，很快成了要好的朋友，他们在大马士革一起下了船。



这天降的运气使得迦迈勒在通过叙利亚边境时没有受到海关官员的检查。并且阿里亲自用他那辆崭新的吉普奥牌轿车将迦迈勒送到了其预定的公寓。这是一座现代化的宾馆，宾馆对面就是叙利亚军队总司令部。迦迈勒住在五楼一套6个房间的豪华公寓里。

稍作休整，第二天伊力·革恩就赶到了叙利亚国家元首的官邸大院，几分钟后受到了叙利亚总统哈菲兹将军的热情款待。哈菲兹总统清楚地记得这位在阿根廷认识的精明能干的爱国青年。“欢迎你终于回到了祖国！”他拉着伊力·革恩的手，坚持要一位官方摄影师为他和迦迈勒·卡明·达贝兹拍一张合影照片，以示他们之间良好的友谊。

之后，总统贴着客人的耳朵小声地说：“我的妻子非常喜欢您给她寄来的皮大衣，让我代她向您表示谢意。”这位爱国者微微欠身低声答道：“区区小事，不用客气。”可这件小事花去了摩萨德1000美元。总统请迦迈勒共进晚餐，同他探讨治国方案。迦迈勒说：“在将军阁下英明领导下，叙利亚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临走，他请求总统的工作人员：“请把我和总统的合影一定冲洗一张寄给我，我将十分感谢，这将是我终身保留的最珍贵的纪念品。”

不出所料，几天后迦迈勒收到了他和哈菲兹总统的合影，他们靠得那么近，显得那么和谐友好，俨然一对莫逆之交。迦迈勒知道：在叙利亚，这是畅通无阻的通行证。

伊力·革恩到达大马士革短短的几个月内，凭着哈菲兹总统朋友的身份，凭着马哈茂德·阿里会长的介绍和那许许多多的推荐信，经常被邀参加各种聚会，结识了许多有影响的叙利亚人士，成功地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叙利亚上流社会中令人尊敬的商业家的形象。他的“卡贝斯进出口公司”效益也日新月异。他出口越来越多的叙利亚古式家具、加斯贝斯游戏桌、首饰和其他艺术品，而他的供货人只要将货物运到，他便立即付款，因此他获得了良好的声誉。

迦迈勒甚至和一些供货人商定，以瑞士银行的户头结算一部分发票，而这些户头都是他去欧洲办理业务时特意开设的。这虽属非法，但却深受叙利亚商人的欢迎。迦迈勒经常和这些商人在大马士革旧城哈姆迪亚商业区广场上的小店里喝芬芳的土耳其咖啡，一呆就是几个小时。从这些商人的嘴里总是不经意地透露出一些重要的情报，这构成了他发给特拉维夫有关叙利亚经济情报的基础。

总之，迦迈勒在短短数月内建立了稳固的关系网，甚至叙利亚总参谋长的侄子马齐克中尉、新闻发布官和政府新闻部领导人乔治·塞以及精锐伞兵团团长萨拉姆·卡度姆都成了他无话不谈的好友。

马齐克和卡度姆多次把迦迈勒带到戈兰高地叙以边境地区。任何一个贫民如果闯入这个地区，都将不经任何警告地被当场打死。可众所周知，迦迈勒是哈菲兹总统的朋友，又有参谋长的侄子陪同，因此他在戈兰高地前线所有的指挥部和军官营都受到了热烈欢迎，他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高地上的军官们炫耀他与总统合影的照片。在戈兰高地上，迦迈勒亲眼目睹了苏联顾问正在指挥构筑巨大的用以隐蔽远程大炮的钢筋水泥地下掩体。叙术亚人对迦迈勒如此信任，甚至允许他用日本相机拍摄高度机密的一三〇毫米新式大炮的设施。迦迈勒告诉旁边的叙利亚军官，这架照相机是他因业务关系去日本旅行时买的，并说：“如果你们真的很喜欢这架相机，就自己照几张吧！我愿意帮你们冲洗。”

军官们更加热情地向他介绍阵地布置及总防御体系计划。“这些抽象的计划真令人难以看懂。”——迦迈勒谦虚地承认。于是那些高级军官们争先恐后地向他进行解释。有几



次，他希望在某一点上再补充解释。他对这些陌生的军事领域的活动流露出极大的兴趣，对他们为了消灭约旦河谷里可恨的犹太人而采取的方法表示出极大的震惊和近乎天真的热情，这一切都使叙利亚军官们受宠若惊，不知所以然。

他几乎走遍了整个戈兰高地，昔日和平的圣土如今变成了根据俄国军事理论一再修改的24公里长的现代马奇诺防线。这道防线的强大火力点都构筑在海拔550米的悬崖峭壁上，整个防线的交通壕犬牙交错，从山下的村庄是看不见的。高地上到处都布满了反坦克地堡、钢筋水泥观察哨和机枪掩体。厚实的钢筋混凝土保护着一门门重炮，而弹药库全部建在地下。叙利亚军官还领着这位参观者观看了保护这些设施的地雷区、木笼和铁丝网。

一次，迦迈勒还在萨拉姆·卡度姆陪同下观看了炮兵演习，在脑子里记下了这些大炮的精确坐标。并且，迦迈勒还在库奈特拉市停留了几天，该城是整个叙利亚南部军事体系的神经中枢。人们向他介绍了这个地区的情况，领他参观了雷达站。叙利亚军官们做梦都想不到，参观者那经过超级训练的记忆力已经记下了全部军事细节。每天晚上，当他回到豪华的房间后，便紧紧地锁死门，拉拢窗帘。这时，叙利亚大商人迦迈勒·卡明·达贝兹的角色消失了，他变成了以色列间谍伊力·革恩。

在他卧室的床旁放着一个梳妆柜，夜幕降临的时候，伊力·革恩就从柜子的夹层里取出微型发报机，将白天获取的情报译码发出。他将发报天线安放在屋顶邻居们的天线之中，因此发报效果很好。他还要在洗澡间里将白天拍摄的照片冲洗出来，制成缩微胶卷，然后把它寄到他的公司在苏黎世或慕尼黑的“办事处”（哈密德在那里负责推销叙利亚的商品）。

但是，伊力·革恩并非每晚都能在房间里秘密地从事这些工作。因为这套坐落在繁华地段的寓所利用率非常高，伊力·革恩经常在这里宴请他的叙利亚朋友们。他慷慨地拿出各式各样的饮料、昂贵的食品和用印度大麻的茎、叶制成的麻醉品招待诸如达拉·萨利上校等重要的客人。

不言而喻，叙利亚人非常喜欢这套豪华的住宅，啧啧赞叹那些昂贵华美的地毯、装饰现代化的厨房和洗澡间。但他们更奈赞那张舒适好客的大床，伊力常常在他举行的小型晚会上殷勤地接待他朋友们的情妇——那些姿色各异的女秘书、空姐、女演员，他鼓励他的朋友们有机会就到这里来寻欢作乐。但迦迈勒似乎从未被这些漂亮的女客人迷住过，他总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当然，有时他也装作酩酊大醉的样子，这样就轻而易举听到了朋友们无意时泄露的机密。

有一次，迦迈勒正要去欧洲办理业务（其实他真正的目的是回以色列详细汇报情况），达拉·萨利上校这位叙利亚最著名的军官请求他能否把房间的钥匙留下来，迦迈勒立刻爽快地答应了，尽管这是很冒风险的：藏在他屋子内的发报机或其他间谍工具有被发现的可能，但他认为还是值得的。因为上校可能会因此更加信赖他，给他看一些高级绝密材料，领他参观全国的军事基地和国防设施。这样，萨利上校和他的情人在迦迈勒的房间度过了整整两周美好的时光，对迦迈勒感恩不尽。以后，迦迈勒经常到萨利上校的办公室闲坐，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连警卫人员也不再要求他出示证件了。

有一次，迦迈勒正在萨利上校的办公室里看一份“绝密”文件，一位官员走了进来，狠狠地把萨利剋了一顿，使这位以色列间谍心里一阵害怕。萨利却回答：“噢，这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兄弟，这和我自己念文件没什么两样。”有几次迦迈勒趁萨利不在时来到他



的办公室，一边等他回来，一边不慌不忙地拍摄了各种各样的文件。

晚上，迦迈勒返回他那五层楼上的套间里发报。他居住的这套公寓是经过反复筛选而最终确定的。一来这套房子街对面就是叙利亚军队司令部大楼，根据大楼亮灯窗户的数量，迦迈勒便能猜出是否正在计划一场军事危机。大楼里活动的异常增加，比如许多高级轿车和官方汽车的频繁往来，整个大楼彻夜灯火通明，往往意味着叙利亚准备在叙以边界的某个地段发动一场进攻。另一方面，这个住宅区还有十几座各国大使馆和联合国蓝盔部队的大楼。他们都拥有大功率的收发报机，而且对面叙军总司令部的发报机也在每天不停地工作，这就为迦迈勒的发报提供了最佳掩护，使他快速发出的电波不易被人注意。

他房间的有利位置很快起了作用。他到大马士革两个月后就发出了第一个电报：“一连四个夜晚，叙军总司令部里彻夜灯明，没有任何政变的迹象，可能是一场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近几天，广播、电视、报纸特别反常，街上有部队调动。”26小时以后，加利利湖的前沿观察哨证实了这个消息：有一大批来自大马士革的装甲部队正在行动。于是，以色列对叙军的士克比军事基地发动了突然袭击，并摧毁了这个基地。叙军意识到以军已处于一级戒备状态，装甲部队于是掉头返回基地。

总之，到达大马士革最初的日子里，伊力·革恩就充分显示了自己是一个才智过人的谍报人员：他总是圆满超额地完成各项任务，他对叙利亚政局变化所提出的看法为未来事件的发生作了极其准确的预测。因此，摩萨德的头儿一接到他的情报，总是尽快上报总理本人，本·古里安总理曾不止一次根据伊力·革恩报回的情报，作出了是否要进攻叙利亚这样重大的决定。

摩萨德“代号928计划”照常进行着。

窃取水源改道方案

弄明白叙利亚切断以色列水源的计划。这是伊力·革恩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这项计划的直接原因是：发源于叙利亚戈兰高地的约旦河与雅穆克河一起流入加利利湖，以色列人在湖上建立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管道系统以供应全国用水。

水是生命之本。为了使以色列全国陷入瘫痪，叙利亚制定了改变约旦河源头巴尼亚斯河和哈兹巴尼河流向的计划。这项耗资庞大的工程由南斯拉夫一家公司承包。哈菲兹总统宣称：“这是我们叙利亚的秘密武器。”

以色列摩萨德总部命令伊力·革恩尽书弄清有关这项计划的一切细节：图纸、设备型号、安装的准确位置等等。以色列人知道，如果这项计划得以成功，对他们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萨利上校和卡度姆上校非常乐意讨好这位哈菲兹总统的朋友，卡度姆上校的部队恰巧又负责保卫这项工程。一次，迦迈勒似乎随便地谈起中东水源问题，他不无神秘地建议：“如果我们搞一项大工程用以切断以色列的水源，那么以色列全国必将陷入一片混乱，我们就可以乘机打过去。”听了迦迈勒的话，卡度姆上校四下望了望，凑近他的耳朵故作神秘地回答：“在哈菲兹总统的直接领导下，参谋部、政府机关带领一大批水利专家已经制定出了一份详细周密的开凿水渠、修建庞大抽水站的计划，这项计划实施成功后，约旦河水就会干涸，以色列必将瘫痪。”



“有这么大的威力吗？”迦迈勒故意露出疑惑的神情。“你们商业家对这自然是外行了，你看——”，卡度姆从保险柜里翻出一打材料，“这就是我们的计划和图纸，以及各个阶段的施工日程。如此周密科学的计划，如此规模巨大的投资，不成功才怪呢。到时候，以色列人就完蛋了！”——上校嘿嘿地笑了起来。“是吗？”迦迈勒好奇地翻着材料，经过专门训练的头脑迅速而准确地记下了一切。

1964年11月，根据伊力·革恩的准确情报，以色列的重炮突然袭击了叙利亚的约旦河水改道工程，摧毁了工地上的堆土机、抽水站和其它战略设施。这项工程不得不就此搁浅了。

计划的终结

“代号928计划”在叙利亚已经实施近6年了，6年来以色列摩萨德特工伊力·勒恩打着“卡贝斯进出口公司”总裁的旗号成功地获得了几乎所有人的信任，为自己树立了一个乐善好施的富有商人和坚定的爱国者的形象。他的朋友遍布叙利亚的政界、军界和商界。迦迈勒尤其热衷于叙利亚执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政治活动，他不仅自费对住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富有的叙利亚侨民团体进行了一次宣传性的访问，而且还带回了为叙利亚“事业”在那里募捐的10000美金。为了凑这个整数，他忍痛割爱从自己口袋里掏了2000美元。他亲自将支票交给了哈菲兹总统，总统对此感激不尽：“我代表叙利亚人民向您表示敬意！”

虽然对一个国家说来，这个数目没什么用，但它却再次显示出这位叙利亚出口商的美好心愿和一片爱国热忱。

迦迈勒还经常应邀到总统家作客，他甚至还为总统到杰里科实施过一次秘密使命，成功地游说了哈菲兹的一位政界宿敌返回叙利亚与其并肩战斗。迦迈勒完全打入了叙利亚领导阶层，他被选进了复兴社会党国防委员会，还经常被请到电台发表讲话，号召那些南美洲的同胞们支持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英雄的领导人。

在以色列，这些广播被一字不露地录了下来，因为已事先商定好，一旦发生突发情况，伊力·革恩将在呼吁他的“阿拉伯兄弟们”帮助复兴党的广播演说中送出他的情报。所以，摩萨德要仔细地研究其中的语言。

现在，作为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国防委员会著名成员，迦迈勒可以名正言顺地在戈兰高地叙军南线司令部视察，并且有权过问戈兰高地发生的所有情况。

军官们自然乐于奉承这位权力极大的来自大马士革的实力派人物，他们向他讲解俄国人设计的庞大防御工事网的神经中枢地点，陪他参观戈兰高地上巨大的军事仓库。仓库里装满了各种苏制新式装备：地对空导弹、新式反坦克兵器、大口径大炮，还有几百辆当时最先进的苏制T54型坦克和米格-21型战斗轰炸机。迦迈勒上衣的第二只纽扣内安装了微型摄像机，他悄无声息地拍下了一切。

这样，要通过慕尼黑和苏黎世转送的文件越来越多，迦迈勒不得不将其中很大一部分藏在“卡贝斯进出口公司”越来越多出口的古旧家具的桌腿里、假抽屉的夹层里，这些外表毫无损伤的家具从未引起叙利亚海关人员的怀疑。

“代号928计划”执行的6年间，伊力·革恩为以色列获取了大量有关叙利亚军事、政



治、经济的绝密情报，正是这些情报，以色列领导层作出了许多针对叙利亚的重大军事和外交行动。6年来，虽然伊力·革恩用来掩护自己的假身份表面上十分可靠，但紧张而又冗长的活动在他身上还是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他每年只能抽空一两次回以色列“度假”，看望一下妻子和孩子。常年处于高度紧张和戒备状态，伊力已经精疲力竭了。

1967年2月，大马士革接连下了几天的霏霏细雨，卡度姆上校到伊力家作客。共进晚餐时，卡度姆谈起哈菲兹总统和叙利亚特工部门的首脑已作出了一项新的战略决策：把所有巴勒斯坦难民团体中的积极分子集中起来，建立统一组织。这些人在叙军兵营内接受秘密训练后，将对以色列开展游击战争。

卡度姆离去后，午夜12点，迦迈勒取出微型发报机，将刚刚获得的情报发回以色列摩萨德总部。然后他轻轻转动开关，调准频率，他将像平时一样在这个频道上接受摩萨德的信号。

突然，门“砰”的一声被撞开，10个全副武装的便衣人员冲进了房间，伊力·革恩来不及反应，两手便被带上了铐子。这时，一个穿军装的人踱到他的身旁，伊力马上认出是叙利亚反间谍机关的领导人阿哈迈德·苏韦达尼上校。

伊力被带到反间谍机关总部一间四壁皆空，甚至没有床、没有被褥的隔离室，在手枪的威逼下，他接受了向特拉维夫发报的命令。一群叙利亚反谍技术人员团团围住他，以验证他是否真的服从了命令。苏韦达尼上校决定向特拉维夫提供假情报，他口授一份电文，由工作人员抄下后交给伊力·革恩。伊力在发报机上发出了联系信号，几秒钟后，回电接触良好，可以继续。

叙利亚无线电专家们盯着伊力·勒恩的每一个动作。但他们却没能觉察到，这位以色列间谍非常稍微地改变了发报的节奏，表面上他按命令一丝不苟地发出了手中的电文，但却借此机会向摩萨德发出了报警信号。

发报之后，伊力·革恩被带到审讯室，威逼、引诱都无用，伊力·革恩受到了严刑拷打。苏韦达尼想从他嘴里挖出所有叙利亚境内以色列谍报人员的名单，但伊力·革恩没有妥协。

已经是第二天凌晨3点，伊力·革恩被推回了隔离室。遍体鳞伤的他无力地坐靠在墙边：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了？6年来，他的所作所为天衣无缝，从来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对他有过丝毫怀疑，他和他的朋友中没有一个人受到过跟踪以致被捕。

伊力·革恩百思不得其解。“明天等待我的又将是什么呢？‘代号928计划’就这样完蛋了吗？”——伊力·革恩处于半昏迷状态，过去的一幅幅画面如过电影一样显现在脑海中，……

苦难的经历

1930年4月5日，伊力·革恩出生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居住区。他的父母都是正统的犹太教徒，他从小就从他们那里接受了正统的教育。他的一个姐姐、两个弟弟是不做祈祷的，在安息日时，他们总是恣意在大街小巷玩耍。与兄弟们相反，伊力则一丝不苟地遵守着所信仰的犹太教的清规戒律。每逢宗教节日，人们总是看见他和大人们一起呆在犹太教堂。



伊力五周岁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他聪明勤奋，是班上最好的学生。小学毕业的时候，他得到了一笔到法国中学念书的奖学金。在那里，他同样出类拔萃，尤其在数学和外语方面，学得特别轻松。他的记忆力格外惊人，连他的父母都感到惊讶。有一次，他曾在他们家里的阳台上连续呆过4小时，在一张纸上随手记下了所有从街上驶过的汽车的牌子和牌照号码。然后他把这张纸交给父母，一字不漏地向他们背诵了他刚刚记下来的这些车名和号码。13岁生日时，父母送给他一架柯达牌相机，从此，他成了摄影迷。

中学毕业后，伊力·革恩考上了埃及亚历山大工程学院，攻读电气工程专业。1947年，伊力·革恩念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影响整个中东国家命运的事件：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分治决议宣布：（1）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应于1948年8月1日前结束，此后两个月内在巴勒斯坦成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2）阿拉伯国面积为11000多平方公里，包括北部的加利利、约旦河以西地区、加沙地区和雅法市的阿拉伯区；犹太国面积为15850平方公里。

分治决议不顾当时阿拉伯人占巴勒斯坦总人口的1/3，居住土地占总面积的94%的现实，却把巴勒斯坦领土的57%划给犹太人。阿拉伯人反抗这个决议，整个中东骚乱起来。在德里、巴林和德黑兰，武装的阿拉伯人冲进犹太人居住区，几百名犹太市民死于非命。

1948年5月14日，本·古里安向全世界宣布：以色列国诞生了。第二天，5月15日，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5国军队向以色列实施了全面军事行动，埃及、叙利亚等国内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包括伊力·革恩一家，在一次突然的搜捕中被捕了。这时，埃及境内的犹太人有30万之众。

和平不复存在。整个中东陷入一片仇恨的火海中。

伊力很快意识到，在埃及再也不会他们有犹太教徒的安生之地了，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成了开罗、亚历山大等城市贫民报复的目标。伊力在大学里也成了学生和教师攻击的敌人，他被迫放弃学业，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当出纳谋生。和伊力同时离开学校的还有一个叫哈吉·斯坎兹的犹太青年。在他的介绍下，1950年伊力参加了以色列特工部门组织的代号为“戈什”的大规模逃出埃及领土的移民计划。在这次行动中，伊力的父亲、母亲、姐姐和两个弟弟都逃到了以色列。伊力曾向他们许诺，一定尽快地和他们团圆。然而，通过协助这次“戈什”行动，伊力对以色列特工组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明白，自己在埃及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这样，伊力·勒恩一直等到6年后才又见到了他的家人。

在这次大移民行动中，伊力·革恩充分显示了其敏捷、善良应变和自我隐蔽的天赋。摩萨德正想吸收一批理想主义的埃及犹太人，以便就地完成计划中规定的间谍任务。于是，伊力和其他4名青年被吸收进以色列特工组织摩萨德。这5个人被秘密送往以色列，接受3个月的破坏活动和特工活动的基础训练，之后又返回埃及。这个时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埃及的犹太人逃往以色列，间或收集其它一些情报。由于5人小组中的一人被捕，在酷刑下最终招供，其余4人一起被捕。虽经多次审问，伊力始终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与这些间谍毫无关系。凭他演员般的天才，骗过当局，被释放了。

最后，被捕的4人中，一人被处绞刑，一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叛有期徒刑15年。

1956年以色列在西奈战役中击败了埃及人。在埃及，有几百名犹太人的财产被充公，犹太教堂先后被烧毁，形成了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伊力·革恩是一个公认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一天他的房子被征用给巴勒斯坦难民，